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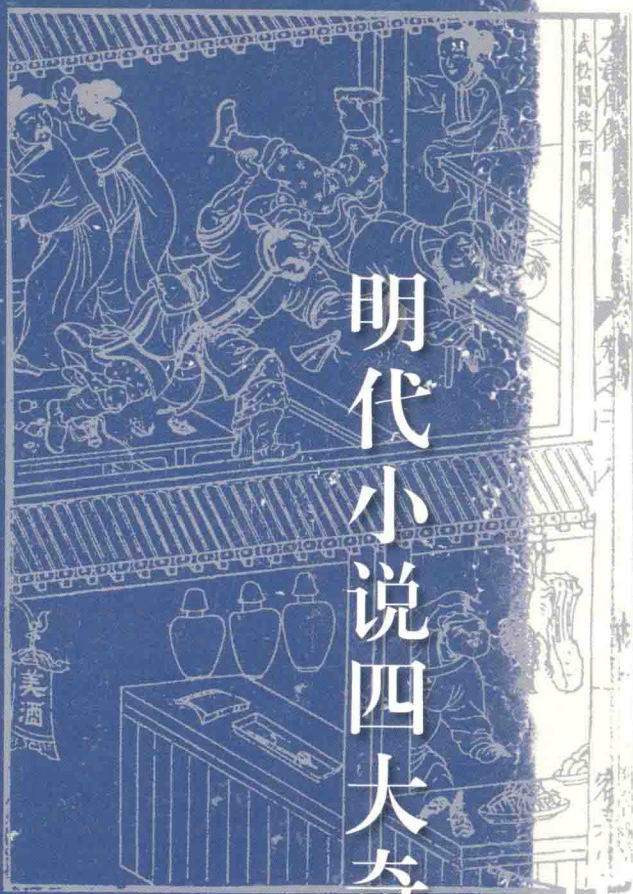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美」  
浦安迪 著

Andrew H. Plaks

沈亨寿 译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shu



明代  
小说  
四大  
奇书

〔美〕浦安迪 著 沈亨寿 译

#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 (美) 浦安迪著; 沈亨寿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9  
ISBN 978-7-108-05301-5

I. ①明… II. ①浦… ②沈… III. ①章回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明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6026 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75

字 数 397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作者弁言

当拙作的华语版将要付梓的今日，我觉得应该附加一言以表达此际喜惧交集之感。我身乃异邦人，来胆大妄为地发表自己对中国文化名作的管见，未免有所畏缩。尽管我从事学习中国语文早已年逾不惑，而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恐仍有颇多不如初学者之处。虽然如此，我所以冒昧提供本书在它们的本国出版以读中国朋友之目，只是因为本书中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学者的角度稍有出入，在下面试说明其一二点。

首先，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着“文人小说”的概念。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所谓“四大奇书”各各脱胎于通俗文化的民间故事、说书等现象，而只是强调这些长篇小说是经过文人撰著者手里的写造润色才得出一新的文体来，这个体裁除了反映明清文人的美学手法、思想抱负之外，也常呈现一层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含蕴深远的寓意，惯用反讽的修辞法来提醒读者要在书的反面上去追寻“其中味”。我特别突出这四部泛称“通俗小说”的作品富有文人色彩的一面，并不敢表示扬雅抑俗的偏见。相反，我的用意正是要推崇中国文化传统

独有的雅俗交融的伟大精神。

第二点，与治明清小说的国内学者稍微分歧的是，我硬取传统小说评注家的读法为首要的解释框架。虽然近年来大陆的中文研究界日益重视此等批评资料，而多半是用来探讨作者版本问题，仍不重视它们对小说本文含义的阐释。正如在本书序文里说明的那样，我认为这一批资料，连在最牵强离谱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因为那些评者本人原来属于四大奇书刊刻行世时的看官听众，因此他们对小说本义的理解比我们异时异地的读者离得近一些。我幸而有机会驰骋在这些批评本之中，多蒙世界各地汉籍图书馆——尤其是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的恩助。在细阅版本上的批语、序跋等文以寻绎书中言外之音时，常感到不谋而合的共鸣，使我这个局外人体会那种远方之朋幸遇同志师友的喜悦。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致谢沈亨寿老先生，他费了三年多的苦功成就本书的译稿。沈先生的翻译不仅确切流畅，而且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处处在英语拙作文理不明的地方竟窥透了原文未能讲通的本义。此外，他又详尽校勘了书中引录的各种研究资料，多处纠正原文内容上的错误。

与此同时，我也想乘此机会向徐朔方教授表达无穷的感激。徐先生对本书原来构思和成文曾有莫大的贡献，后来在中国发表译文一事也全赖他的友好斡旋。此外，在本书写作修改的过程中也曾经请教于多数国内外文研界的老师学友们，深恐拙作会污其芳名，所以不敢一一列举致谢。无论如何，本书有不少不足之处，无非是由于我本人知识不全，读法不对，在此只能垂首敬请中国

朋友笑纳指正，以使我能实现一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愿。

1991年春

(作者以汉语书写)

# 序

鉴于本书篇幅颇大，我想一开头先把自己的意图说一下。从实质上说，本书汇集了四篇研究中国明代所谓“四大奇书”的专著，给它的英语版只好起个颇为单调乏味的书名：*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这些论文皆可独立成篇，分别作为对这几部作品的阐释，听任读者随意取舍。但全书也想提出一些争辩性的论点。为了不浪费读者时间，我想尽可能扼要地将其概述如下。

首先，我对这些“奇书”的见解是基于这么一个信念，即它们只有被看作是反映了晚明那些资深练达的文人学士的文化价值观及其思想抱负，而不仅仅作为通俗说书素材摘要时，才会获得最富有意义的解释。我相信，这几部小说的最完备修订本的作者和读者正是创作了独树一帜的明代“文人画”和“文人剧”精品的同一批人。所以，我不揣冒昧，也许是言过其实地把这些小说称为“文人小说”。

作了这样的交代之后，我便想就下列几个特殊的方面谈一些我的看法。第一，我想证明，这四部作品以它们最成熟的面貌问世，标志着中国散文小说中一种新文体的崛起。我认为，这些作

品尽管在主题和风格上大相径庭，可是在结构和修辞方面的一系列共同特征显示出它们的作者具有强烈的文类意识。虽然，时至今日，除了我把它用来作为本书书名的所谓“四大奇书”之外，还没有给这种文体一个更精确的标名。为了支持我关于这一体裁成形不早于16世纪的论点，我觉得有必要对每一部小说的成书和作者等问题的现有证据作一番详尽费时的概述。这种考证探究并非本书主旨，我也不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有何独特的发现，我之所以试图综述这方面现况，只是想表明16世纪修订本对四大杰作的出现所作出的莫大贡献，并以此阐明它们对早先的说书材料作了何等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当然不是否定通俗故事本身和先行叙述素材在每一部作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只是为了强调说明，这一批新瓶也许比它们的老酒更有意义。

换言之，我想说明，在这里分析的每一部作品都不只是意味着对各自的叙事系统作了最详尽的复述，而实际上是指一道以先前故事来源和通俗意象为素材，进行了主要是反讽处理的彻头彻尾的修改过程。按我的理解，反讽修辞术在明代小说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像稍后时期欧洲小说文体的情况那样，是一把具有两面刀锋的利刃：它一方面生产出一些主要用来削弱通俗文化对英雄人物的意象和褒贬偏情的作品，但与此同时，它又带有树立某种正面形象的必要含义，尽管这只不过是正在崩溃的价值观系统所遗下的废物。在对这四部富有反讽色彩的杰作所表现的意义变化进行试探性分析时，我将尽可能把小说中所表达的观念跟明代思想史背景联系起来。这样，我便特别注意强调那些反映小说本质的“儒家”倾向性——尽管作品中实际表现的浅薄说教



片段似乎完全是用佛、道两家术语来表达的。我将在最后一章总结性论述中设法论证这种说法是有益的。不过，届时我还想说明，这儿一些明显矛盾是无关宏旨的，因为我们在本书中要探讨的始终是构成晚明思想核心的折中论，这种人生观因其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情感而变得更为丰富，然而却从未脱离过当时文学修养和价值的儒家基石。

我坚持对小说进行的反讽阐释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尤其是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现代小说理论这一角度来分析作品的。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希望对中国作品的这种研究方法将不仅能使外国学者把这些作品泛称“novel”更名副其实（我曾在别处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论述），而且同时还可以拓宽“novel”这一术语的定义，使之能接纳非西方传统中类似的文学情况的范例。不管怎么说，本文所要分析的小说“奇书”本身用不着以任何时髦的批评术语来为其证明价值。

然而我对明代小说杰作的处理另有一点需作说明。我必须承认，我对在研讨这些名文时妄自加上自己的批评见解一事不免有过顾虑，因为它们毕竟属于一宗异邦的文化遗产。但我总是不断受到中国朋友和同行们的热情关怀，他们对一位异邦人来阐释本国文学丰碑所持的宽容态度使我的疑虑顿然消释。只要设想一下，在任何其他文化环境中，一位外国学者倘若敢于闯入他们文化遗产的圣地并妄加评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么，上述的慷慨精神就显得更为感人。

此外，还可以谈一下另一种原因，说明我为什么认为本书所提出的见解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陌生，这是因为主要的启发和

指导都来自中国的传统小说评注家。他们的批注附随着不少明末清初小说名著的精刻版本。只因为这些评论家常犯言过其实、各执一词的弊病，近代学者往往把他们的见解摒弃于严肃的小说研究之外。但我相信，这些批评资料的系统运用至少有两大理由可以为它辩护：第一，尽管这种批评常多主观臆度和偏颇离谱之处，但它们的中鹄率与现代批评家的成绩相较，毕竟犹胜一筹。更贴切的一点是，这些评论纵然有精有粗，都使我们得以窥见这几部奇书对当时的看官听众，即16—17世纪的文人读者，所表达的原意。

我得益于早期中国的评注家们，正如我受惠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即把著名通俗小说纳入学术研究课程的老前辈以及大批近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获得的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书第一章能够写成，完全是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鼎力相助的结果。他在1983—1984学年间作为卢斯研究员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帮助我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嘉靖和万历文学的研究生讨论班。我也深深感谢北京的吴晓铃教授慷慨相助，让我分享他的博学宏文。在我这里近处，我的研究显然受益于夏志清、韩南（Patrick Hanan）、柳存仁、雷威安（André Lévy）、芮效卫（David Roy）等外国人的著作，他们从根本上创建了西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领域。此外，还有无数老师、学生、同学们在我写作此书过程中都有过莫大帮助，不能一一举名，只好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作者

1986年6月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 目 录

作者弁言····· 1

序····· 1

第一章 文人小说的历史背景····· 1

第二章 《金瓶梅》：修身养性的反面文章····· 47

第三章 《西游记》：“空”的超越····· 175

第四章 《水浒传》：英雄豪气的破灭····· 271

第五章 《三国志演义》：义士气概的局限····· 361

第六章 对“四大奇书”的理学阐释····· 501

参考文献····· 520

译后记····· 557

出版后记····· 558

## 第一章

# 文人小说的历史背景

自弘治（1488—1505）至万历（1573—1619）中期一百多年间——即大约相当于西历16世纪这段时间里，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四部作品开始以它们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这四部书——《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经过后来某些修订，就成了我们今天阅读的同名小说。<sup>[1]</sup>在构成本书主体的逐一详细分析中将会表明，这四部16世纪的版本没有一部属于崭新的文学创作，而是都经历了对原始素材、先行故事和并行修订本的长期演变，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本书的首要论点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四部16世纪版本都代表了这一演化过程的最重要阶段，即标志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并将各自的故事内容提高到了自觉进行艺术构思的水准。基于这一认识，我的论述便可依循这样一条思路进行下去：我们应该对这些特定版本进行最详尽的研读和阐释，至于这些作品的其他文本，则只能归之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般文献资料而已。

上述这四种修订本一问世，便立即成为随后长篇小说（国外汉学通常称作传统中国的“novel”）发展的范本。事实上，我还可以进一步宣称：正是这四部书，给明、清严肃小说的形式勾画出

了总的轮廓。这四部作品构成小说文类本源的重要地位，恰恰由于作品本身的卓越超群而有点被人忽视，因为它们无比丰富的内容和精巧绝伦的写作手法，同类作品中很少有能与之媲美者，因而，这四部“奇书”在一个半世纪里一直鹤立鸡群，自成一体，直到《儒林外史》与《红楼梦》问世之后，才形成所谓“六大古典小说”。<sup>[2]</sup>

不过，即使在18世纪以前后面两部杰作尚未出现之时，那前四部奇书的特殊地位也已得到理所应得的承认。例如，李贽把《水浒传》列入所谓“五大部文章”之内，金圣叹也把《水浒》列为“六才子书”之一。<sup>[3]</sup>到了清朝初年，书贾们照例把这四部小说的刊印本标为“奇书”；就连后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些次要作品也冠以同样的名称时，他们依然暗示这原先的四部书已提出了用来衡量所有其他同类作品的标准。最后，“四大奇书”便成了一个惯用术语。我不敢肯定这个词语形成的确切时代，但至少早在17世纪刘廷玑写《在园杂志》时就已经用它了。托名“李渔”评点的《三国志演义》序文中也用了这个词语（该序文认为是冯梦龙首创了该词语）。<sup>[4]</sup>到乾隆年间，它似乎已被芥子园刻书坊（它原先与李渔有关）用作一套名为“四大奇书”的小说集的名称。从那时起，它一直沿袭至今，成了一个颇为通行的名称。<sup>[5]</sup>

在提出主要应归功于这四部奇书的16世纪版本（而不是先前或后来的版本）、它们将各自的故事和版本系统改造成为文学丰碑这一问题时，我必须遵循几个思路去加以论证。首先，我将在每一章里论述各个论据，从而设法阐明这些特定版本比它们据传的或现存的早期资料确实有重大的改进。然后，我将对这些文本的

结构和修辞进行详尽的分析，以证明它们在行文上如何错综复杂、艺术手法上达到何等精湛的程度。一旦完成了这项基础工作，我将转向全文的细读和阐述，并设法把这种阐释与当时的某些特定思潮联系起来。

但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先把这种讨论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下，尽可能深远地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也许是有益处的：为何恰恰在此历史时刻，中国长篇虚构叙事文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除了贪图方便，显然没有理由非得固执用“世纪”这一时间框框不可，以朝代纪年的中国传统方法也同样不一定能标出一个个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我们可以选用一种不太严密的名称，把该时代简单称作“晚明”，或者也可以集中在几个文人世代，就像某些学者最近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人们也许宁可超越明、清换代的界限，而把目光转向一大段的文化历史，譬如把1500年至1750年视为更有意义的参考标架。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在这首章中说明：从1500年到1600年，正跨越着这四大奇书流传的100年左右，恰好是各个领域都有显著发展的时期，因此，这个未必可取的“世纪”分期法居然在这里至少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

从广义上说，综观明代历史，应从成就辉煌的建国年代开始。随着明王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该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接着则是漫长的15世纪中叶一段停滞萎缩时期；然后，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发展的步子重又加快，把我们领进一个举世瞩目的繁荣时期，直到王朝倾覆为止。当然，人们把15世纪中叶社会发展步伐缓慢的原因归之于名声和趣味的变迁，以及证据文物的存亡不定而造成的错觉也未始不可。不过，

当时的观察者和现代历史学家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 16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给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某些在长时期内逐渐形成的趋势在此刻呈现出惊人发展的新面貌。<sup>[6]</sup>下面，我将总览有关这些历史趋向的各种学术见解，从而窥见其中与我阐释四大奇书本文紧密有关的说法。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该时期的政治气候。它表现在宫廷阴谋和军事活动之中，成为大多数传统的及现代明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心课题。从明朝的总体盛衰春秋寿年来说，我们所谈的大致是明代后半部分，而明朝的中点恰好是在 1500 年前后。明朝在此时期重新迸发出来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不久又逐渐让位给造成国家空前脆弱及内外交困的内部矛盾。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描述既符合传统的王朝盛衰循环之说，又迎合了某些关于帝国兴衰的现代政治理论模式。<sup>[7]</sup>但当我们着手探讨那些应对“中兴”失败负责的特定因素时，实际情况果然要更为复杂得多。

表面上，这一百年间相对来说是较为和平及安宁的时期。诚然，有名无实的庞大军事力量其时正忙于对付各个外部入侵者。主要的敌人是来自北方的蒙古人，他们早先曾被开国君主和永乐帝驱回大草原，但并没有完全被征服（这有 1449 年“土木之变”的溃败为证）。<sup>[8]</sup>还有倭寇，这些海盗在东南沿海地区大肆掳掠，并深入内地，占领了大块领土。<sup>[9]</sup>这两条战线在该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一直都燃烧着熊熊战火。草原方面的敌人不断进扰，并取得一些显著的胜利，最大的一次是 1550 年蒙古骑兵袭击直逼北京城下；南面倭寇的劫掠使几位最出色的官军将领在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时间里疲于奔命。但尽管国库枯竭、官员腐败，后勤供应出现严重困难，明朝军

队还是勉强控制着局势，显示出相当的持久力。<sup>〔10〕</sup>

晚至 16 世纪末期，明朝政府仍能调动可观的部队来进行那后来夸张地称为“三大征”的战役，虽然这使王朝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sup>〔11〕</sup>史学家凭他们的事后聪明，回顾万历末年的大势已清楚地看出，东北有一股新的军事力量其时正在崛起；但直到 17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左右，迄未出现边疆告急的警报。就这样，从标志 15 世纪中点的“土木之变”到 17 世纪中叶清军入关为止，明朝军队仍能勉强支撑而没有全局危机感。<sup>〔12〕</sup>内部防卫也是如此。自从 1519—1520 年间镇压了宁王（朱宸濠）之乱以后，除了出现一些地区性叛变、骚动及其他动乱之外，足足有 100 年时间没有发生过威胁全国存亡的军事挑战。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王朝的最后数十年。<sup>〔13〕</sup>

不过，在国内后方确乎出现了某种类似“危机”的东西。一连串震撼宫廷并使王朝机构陷于瘫痪的政治争端，虽然多半是属于个人之间倾轧排挤和官员们为争权夺利而进行一般政治阴谋，但在为某些问题纠缠不清的争吵中，那些内部争端的痼疾却成了动摇明朝政体国力的严峻考验。

诚然，潜伏在这些具体竞争领域的深层问题大多并不是新起的。像由于地区、世代和思想不同引起的派别之争、威胁国祚继承的立太子之争、直接听命于皇上的宦官擅权、内廷与外朝之间的制度权限之争，或监察御史与内阁大臣谁掌握实权之争——诸如此类的问题曾世代代困扰中国历代的王朝政府，但正是在这个时期中，某些这类问题开始具有十足政体危机的程度。<sup>〔14〕</sup>

有一点很重要，跨越该世纪、特别长时期在位的嘉靖（1522—



1566)和万历(1573—1620)两皇帝都是任性妄为和刚愎自用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继承了正德皇帝(1506—1521)的遗风。正德的胡作非为在当时是家喻户晓、令人发指的。<sup>[15]</sup>这两位君主在登基后的最初阶段都曾一度维护他们作为君主的独立地位,企图摆脱那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的羁绊,但最后都终于完全退出宫廷的政治舞台,听任弄权谋私的政客长期把持国家大政。

这种从个人专制到玩世不恭、不顾一切的动摇转折反映出制度上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理论上绝无压制的专制而事实上常常流于残暴霸道(公堂上的酷刑最具体地表现了这点);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政府方针的放任自流态度。如像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把这两朝统治中的任何一个说成是“无为而治,仁慈为怀”也许并不确切,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那么仁慈。但是,制度上的“无为”确是完全可以感觉到的。最明显地表现在财政上的倒行逆施、众官要缺长期不补,以及王朝不惜疏远大批文官而热衷于培养扶植朋党亲信,等等。

制度的崩溃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一方面,它造成许多混乱,引起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它也为发挥个人主动性创造机会,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制度上的漏洞使一些铁腕人物有隙可乘,应运而起。这些人中固然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如夏言和张居正,也有祸国殃民的政客如严嵩之流。它们也给从刘瑾、冯保,以及后来的魏忠贤等一连串权势煊赫的宦官以可乘之机,在某些时期得以操纵朝政。<sup>[16]</sup>然而,对于大多数士大夫来说,他们既有机会按儒家之道勇往直前地参与经世事业,也面临一不小心,在与人结盟上发生失误而必然招致可怕后果这样两种可能性